

唐代
边塞诗
研究论文
选粹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第二届年会

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
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甘肃教育出版社

甘肅教育出版社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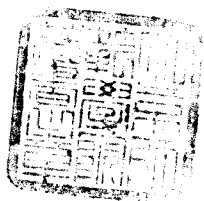
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2831

1152831



责任编辑：张祚羌
封面设计：王占国
版式设计：陈安庆
封面题字：董戈翔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

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
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30,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50

ISBN7-5423-0016-4/I·11 定价：2.65元

序

杨 植 霖

1984年8月在兰州举行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是我国唐代文学研究的一次盛会，也是甘肃省学术活动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来自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区，以及美国、日本、澳门等国家、地区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金城，济济一堂，就如何进一步有组织地开展唐代文学研究及唐代边塞诗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绘唐代文学研究之蓝图，采边塞诗章的奥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和祖国的文教事业作出新的贡献。我省党、政领导自始至终对这次会议给予关心和支持，省委及其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不止一次出席会议，有的还作了重要讲话，欢迎大家实行“智力支边”，开发甘肃，开发边疆，更给与会代表以极大鼓舞。

边塞诗在唐代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就它反映的时代生活内容，就它艺术上的成就，就它在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都值得展开深入的研究。我在会上的发言讲过，唐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应该有一个新局面，要用改革的精神开展唐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边塞诗的研究也应该这样。研究工作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目的是一个：鉴古以知今，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事业服务。党中央已经提出在2000年前后，将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大西北。与内地相比较，边疆建设历来不被重视，只有中国共产

党，才能定出把建设重点转向西北边疆的国策。大西北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但人口仅占十五分之一还不到。在这块地方，地上、地下都有开发的前景。大西北兄弟民族很多，又是国防重地，开发大西北，无论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加强民族团结诸方面都有重大意义。唐代的边塞诗，多数是写大西北的，对大西北的影响很大，积极精神和消极精神都有。经常被人们咏叹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等诗句，长期给人留下大西北荒凉的印象，至今还多少起些不好的作用。我们应该除去消极精神，用积极精神歌颂大西北，扭转人们对大西北的不正确看法。这是我们研究边塞诗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提交这届年会的百余篇论文中，边塞诗研究方面的就有六十多篇，这是一个好现象。这些文章，从边塞诗的性质、涵义，到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问题，从唐代边塞诗的渊源、繁荣原因到它对后代的影响，从史的宏观的研究到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介，内容丰富多采，涉及的面相当宽广，也提出了许多比较深刻的有价值的见解。在一次会议上集中了这么多文章，这在边塞诗研究上是空前的，对于推进我上面说到的研究任务的实现，确乎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这个基础上，编选出版一部边塞诗研究论文集十分必要。

记得刘冰同志在会上讲过：甘肃是唐诗中边塞诗流派的策源地之一。选择兰州来举行边塞诗讨论会，不仅是适宜的，对于活跃我们甘肃的学术风气，促进甘肃的文化事业，无疑会产生良好的作用。现在可以说这个预言已经有了成果，学会委托西北师院编辑，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便是这样的一个成果。聂大江同志在会上也讲了：我们已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叫“边疆开发学”，呼吁大家关心西北的开发建设。唐代边塞诗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唐代边疆开发学的研究，它不是也可以为我们今天的边疆开发学提供历史的借鉴

吗？我希望这样的研究成果将会愈来愈多。让我们团结一致，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为繁荣唐代文学研究，也为繁荣我们西北的文教事业，开发大西北努力工作。

1986年春于兰州

目 录

边塞诗泛论·····	谭优学 (1)
关于唐代边塞诗评价的几个问题·····	肖澄宇 (19)
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	胡大浚 (36)
唐代边塞诗与传统征戍诗·····	邱俊鹏 (53)
也谈唐代边塞诗派的评价问题·····	秦绍培 (63)
送入吐蕃使诗初探·····	吴逢藏 (75)
试论唐代有关南诏的诗歌·····	余嘉华 (88)
——兼谈边塞诗评价的几个问题	
战士之歌和军幕文士之歌	
——从两种不同类型之作看盛唐边塞诗·····	余恕诚 (109)
“文章四友”和盛唐边塞诗·····	徐定祥 (125)
说王维的边塞诗·····	王拾遗 (145)
试论王昌龄边塞诗中的“非战”思想·····	曾子鲁 (154)
浅论李白的边塞诗·····	侯萃琼 (163)
略论唐代前期唐蕃关系及高适、岑参有关唐蕃 战争的诗歌·····	郑 文 (172)
岑参边塞诗的风格特色·····	廖 立 (186)
谈岑参的边塞诗·····	周振甫 (200)
因事以出奇	
——岑参边塞诗浅议·····	林家英 (207)
浅论岑参边塞诗中的功名心·····	李道英 (217)
岑参边塞诗地名笺释·····	孙映达 (229)

论中晚唐的边塞诗·····	董乃斌(252)
试论中唐边塞诗·····	王昌猷 周小立(267)
李益边塞诗抒情特色论析·····	马承五(282)
刘商及其《胡笳十八拍》·····	李鼎文(297)
评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边塞诗”·····	陈祖美(311)
于湋边塞诗的特色与晚唐边塞诗的衰微·····	梁超然(324)
高适、岑参、王昌龄的边塞诗在国外·····	王丽娜(333)
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综述·····	洞 岩(356)

边塞诗泛论

谭优学

何谓边塞诗

近年来，有同志写文章说边塞诗“讴歌了不义战争”，“理应受到批判”^①。又有同志写文章，说边塞诗不能否定，说了许多理由^②。这儿我试从“宏观”角度谈一些我的看法：边塞诗不能否定。

唐边塞诗是以题材分类的一种称呼。如举代表作家，又称高（适）岑（参）诗派。

边塞诗派作品不但在唐诗中有很高的成就，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很出色的。因为它充分地表现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中经常起作用的一桩历史事实：民族矛盾以及与民族矛盾伴随着的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主要发生在沿长城一带的边塞上。长城本身也就是这一矛盾的历史见证。因此，在概念上它是有地域性的^③。人事地理，时间空间自然不可分割，于是边塞风物的描绘，将帅士卒的刻画，爱国主义精神的歌颂，对穷兵黩武、长征久戍的厌倦非难，将帅士卒间的阶级对立，征人思妇的离愁别苦，……都以民族矛盾为主线而相互交织在一起。所以，边塞诗有极为丰富的内容，为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提供了新奇广阔、足供驰骋的天地。而主要的边塞诗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曾到过边塞：或负羽从军，或秉笔参幕，或浪游羁旅，大都有过丰富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

既深，写出来的作品也就有充实的内容，有充沛的激情，有鲜明的形象，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而能够扣人心弦，动人肺腑。

但反映民族矛盾的诗篇不始于唐代。事实是有民族矛盾，就有反映这类矛盾的作品。因为文学本来就应该反映社会现实的。何况民族矛盾又是十分重大、主要，关系着汉族政权之兴衰存亡，千家万户之苦乐荣悴的现实呢？从广义说，三百篇中的《采薇》、《出车》、《六月》不就是西周末期的“边塞诗”吗④？汉乐府《战城南》⑤、古辞《十五从军征》、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不都可以说是“边塞诗”吗？但与我们文学史上所谓的边塞诗的固定涵义，究竟是有区别的。我们所谓的边塞诗，首先是指唐代，而且指盛唐，它是有时间性限制的。如初唐的崔融、陈子昂便曾从军塞上，也有几首边塞之作，“四杰”亦有这类性质的作品，就是盛唐与高、岑同时的常建，稍后的戎昱，亦何尝没有几篇反映民族矛盾，杂以阶级矛盾和边塞风物的边塞诗呢？但或以篇什较少，不是它们作品中的主要部分；或以未身至边庭，按习惯一般都不将它们列入边塞诗派。这要看一个作家作品的主要倾向。正如王维也有好的边塞诗，也曾身至塞上，可他却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主将。至于身在内地的诗人，按乐府旧题所写“出塞”、“入塞”、“塞上”、“塞下”、“从军行”、“关山月”之类的乐府诗，即有新意如李、杜之作，也不好将他们列入边塞诗派了。约定俗成，这是有道理的。

可见，我们文学史上所说的边塞诗，以地域而言，主要指沿长城一线及河西陇右的边塞之地（秦长城西起临洮、经兰州，其实也可包括河、陇）。以作者而言，要有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以边塞诗作者的作品而言，要是他们作品中的主要成就部分。概念弄明确了，才不至于夹缠和漫无边际。因此，本文便只就盛唐七位基本上符合上述概念的诗人：王翰、王之涣、李颀、崔颢、王昌龄、高适、岑参和大历年间有《从军诗》集的李益，作为谈

论的对象。对同时代的有些虽非边塞派的诗人，其作品可算边塞诗的，亦间有涉及。

边塞作品的背景探索

《新唐书·突厥传》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其中抗衡最久，矛盾最大的还要算吐蕃。东北的奚、契丹也曾和唐王朝发生过较严重的矛盾，但为时不久。开元中，东突厥大举入侵，天宝初即已被灭了；西突厥除与唐小有争战外，大都相安和好。至于和云南的矛盾已在天宝末解决。且“南徼北塞”，地理有方位之别，故高适《李云南征蛮诗》这投赠捧场的恶作，本文姑置于边塞诗之外。所以就活跃于开、天之世的这一群边塞诗人说，其主要所反映的民族矛盾，多为吐蕃而发。然是时唐王朝国力强盛，势力向外发展，多有成功，与天宝乱后的被侵略，取守势，完全不同。

太宗、高宗、武后三朝，若干次大规模的对外用兵，获得重大胜利，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声威的大帝国。到玄宗时，国内生产力继续发展，国际商业资本继续活跃，对外的用兵便继续取得若干次的重大胜利，伴随而来的就是他的好大喜功，为防御而走得过远。

综观两《唐书》四裔传，《本纪》及《通鉴·唐纪》，玄宗在位的四十四年间，败吐蕃，定奚、契丹，灭东突厥，是玄宗朝对外用兵之荦荦大者。而和吐蕃打交道的占绝大多数。其中有和吐蕃直接在青海交锋的；有为和吐蕃争夺西域，保卫安西四镇而战的。何以呈这种状况呢？近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云：“吐蕃之盛起于贞观之世，至大中时，其部族瓦解衰弱，中国于是收复河湟，西北边陲稍得安谧。计其终始，约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者也。……李唐承

裴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值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宁，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之原因。”

可见唐与吐蕃两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从“宏观”角度观察，汉唐帝国与沿河陇、长城一线的少数民族的斗争，乃有其历史的必然。刘昶同志在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一文中说^⑥：

打开中世纪的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游牧生存圈大致包括从西亚开始连接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一直到蒙古高原这样一个广袤的地区。这一大片地区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是大体相似的，戈壁和草原占据了地面的绝大部分：不是严寒，就是酷暑，年降水量在五百毫米以下。除了少数沿海、沿河的草原适于农耕以外，绝大部分地区只能畜牧。因此这里就成了游牧部族的生存圈，大舞台。在这个地区兴起过波斯人、匈奴人、月氏人、柔然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等等的强大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是他们每一次崛起都给这个生存圈周围的农业居民带来巨大痛苦，灾难和毁灭，同时也激起强烈反抗。这种挑战和应战往往构成中世纪舞台上最有声色，悲怆雄壮，动人心魄的场面。

吐蕃系出西羌，和上列诸“人”同属于游牧民族性质。刘文又说：“中国北方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各个游牧

部落活动的舞台。……。数千年来，这些游牧部落不断地对中原进行骚扰和侵掠，给中原人民造成许多灾难和痛苦。游牧部落主要从事原始的畜牧业生产，这种落后的单一生产方式，决定了它不能完全满足游牧民正常的生活需求及应付人口繁殖造成的新压力。为了解决这种困难，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掠夺周边的农业居民。这种掠夺方式是受其经济生活的影响制约而逐渐形成的。久而久之，就硬化为一种习惯，以致在他们看来，‘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特别是当游牧部族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并暂时地克服内部分裂而统一起来的时候，往往表现出特别强烈、贪婪的掠夺性和侵略性来。氏族贵族和军事首领往往率领整个部落、部落联盟，大规模地侵袭、掠夺周边的农业定居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和破坏。”恩格斯说：“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如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而团结在一起，并且由于生产力太低，每一个人不是做奴隶就是拥有奴隶等等。因此隶属于某个民族，成了人最自然的利益。”（《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强烈希望“拥有奴隶”以免自己做奴隶，入侵就特别凶猛。汉人被掠去做奴隶，真是史不绝书，清朝入关之初都还如此。而农业居民的汉人却不需俘获少数民族的人做奴隶。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产生广义“边塞诗”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承认开、天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⑦，那么，为此而进行的一些战争就不能说完全是非正义的。毛泽东同志说：“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五五页）可见当时唐王朝和吐蕃等所进行的战争，按其本质，应属于农业居民抗击游牧部族的掠夺。为了“预防”，

“根绝”这种无止期的掠夺和侵扰，唐朝的统治者不得不进行反击和自卫的战争，这种战争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先进经济和先进文化的作用。既然有这种重大的客观社会现实存在，就必然有反映这种重大的客观现实的作品——边塞诗，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们如果进一步具体分析这些战争的性质，其中有的战争固然有非正义的一面，如一般人所说的取石堡，收九曲。但根据上述理由，却不能说它们完全是非正义的。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游牧部落如突厥、吐蕃、回纥、奚、契丹等的情况吧。

《隋书·突厥传》说：“其俗以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居。”“贱老贵壮，善骑射，……无文字，刻木为契，候月将满，辄为寇钞。”贞观初，薛延陀答唐太宗说：“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诏？然突厥反复难信，其未破前，连年杀中国人动以千万计。至尊破突厥，须收为奴婢，将与百姓。而反养之如子，结社率竟反，……不可信也”（《旧唐书·突厥传》）。开元时，东突厥毗伽可汗的谋主敦欲谷对毗伽说：“突厥人户寡少，不敌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随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生，又皆习武。强则进兵钞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同上）。吐蕃则“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其兵法严而无馈粮，以卤获为资。”他们的战斗力极强：“贵壮贱弱，重兵死，以累世战歿者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穹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每战前队尽死，后队乃进。”（《新唐书·吐蕃传》）至于回纥，也是“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钞为生，自突厥有东西征讨，皆资其用”（《旧唐书·回纥传》）。东北的奚、契丹“……其余风俗与突厥同。”“风俗并于突厥，以畜为业，迁徙无常”（《旧唐书·北狄传》）。战斗力也是相当强的游牧民族。正因为他们经济、文化上的落后，相反，战斗力却很强，所以特别富于侵略

性。恩格斯曾经指出：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获得财富已成为他们的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他们进行战斗，仅仅为的报复侵犯，或者为的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只是为的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家族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野蛮与文明》）

恩格斯的这番话用在中国历史上灵不灵呢？应该说是灵的。所以从秦汉以来，以农业居民为主的汉族政权对付这些游牧民族是要用很大力气的，唐朝当然也不例外。历来我们兄弟民族当时为了生活，兵戈相见，鏖战沙场，是曾流过不少血的。史实俱在，不必讳言。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民族之间的矛盾除了用“战争解决问题”而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比如和亲），这是时代的限制，历史的必然。汉唐是强大的帝国，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国家。但虽然强大先进，却并不一定就能制止游牧民族不来入侵。因为“邻人的财富，刺激了他们的贪欲。”伟大诗人李白就曾指出：“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实指唐）仍有烽火燃。”（《战城南》）王昌龄也说：“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塞》）都算抓住了这种矛盾本质的慨叹。

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曾有哪一个亚非拉落后的弱小国家民族去攻掠过强大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呢？没有。都是资本主义强国，这些殖民主义者去侵略奴役亚非拉的弱小国家民族。如果有人将我国历史上汉唐的对外战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宰割殖民地、掠夺弱小国家民族（我们这“弱大”民族都未能幸免！）混为一谈，这是缺乏具体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汉唐的对外用兵，其中的确有些是刘彻、李隆基个人好大喜功，穷兵黩

武，欺压邻国。如天宝中的征云南，即其曲在唐。就整个历史过程而言，却是沿长城一线的少数游牧民族向中原侵犯。獫狁比周落后，却把周王室弄得焦头烂额。匈奴比汉落后，但汉初七十年屡受其侵掠，烽火直达甘泉。突厥比隋唐落后，但几乎活捉了隋炀帝，李渊曾向之称臣，定都长安后，以威胁太大，致有迁都樊邓之议。武德七年、九年，突厥倾国南犯，直抵渭水北岸。至于以后的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灭明，就更不用说了。之所以形成我们今天伟大的中华民族，尧封禹域的历史车轮仍然滚动向前，那是由于入主中夏的征服民族的文化低于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因而征服者就不得不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甚至融合于被征服民族。这种情况，被马克思称为“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情况不正是这样的吗？所以那时，问题不在于你的经济先进或落后，野蛮或文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主要靠政治修明，国富兵强，才能抗击游牧部族的入侵，否则，汉唐虽大，亦不能挡住“胡骑凭陵杂风雨”而来的袭扰。刘昫于《吐蕃传》后总结性地说：

戎狄之为患也久矣。自秦汉以还，载籍大备、可得而详也。但世早小康，君无常圣，我衰则彼盛，我盛则彼衰，盛则侵我郊圻，衰则服我声教。怀柔之道，备预之方，儒臣多议于和亲，武将惟期于战胜，此其大较也。

其实和亲、战胜这两种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历史证明了的。问题的解决，只有靠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的民族政策。可那时还没有，只剩下“战争解决问题”了。刘昫又于《回纥传》后说：

蔡邕云：“边陲之患，为手足疥，中国之困，为胸背之疽。”突厥为炀帝之患深矣，隋竟灭。中国之困，其理昭然。开元中，三纲正，百姓足，四夷八蛮，翕然向化（学按：不全如此），要荒之外，畏威怀惠，不其盛矣！天宝末，奸臣弄权于内，逆臣跋扈于外，内外结

衅而车驶遽迁，华夷生心而神器将坠。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乾，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无以抑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

这也的确道破了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的尖锐还是缓和同国内治乱及国力盛衰的关系。盛，如所谓开元中“三纲正，百姓足”，这样，即使有异族入侵也可以制御之而“宁在四夷”，如太宗、高宗、玄宗前期之世。相反，如西晋王朝的覆灭就是这样，陷中原农业居民于两重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这当然应由封建统治者的罪恶统治负责。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民族矛盾，完全不同于近世。从形式上看，倒很有点“弱凌强，寡暴众”。既然二者不能比附，就不好一概说汉唐的对外用兵为侵略。也不能用“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来为“侮人”、“伐人国”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开脱和辩护。以今喻古，侵入者与被侵者的情况恰恰相反。那么，笼统地说边塞诗是“讴歌不义战争的诗篇”显然是不妥当的。

边塞诗的主要背景——唐与吐蕃的矛盾

唐与吐蕃发生矛盾，经常交锋的地方有两处：一是直接的国防前线河西、陇右，即今甘肃、青海；一是间接的国防前线安西四镇，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剑南川西则是交锋的侧翼）。而这两处又是辅车相依，唇亡则齿寒的。如武后长寿年间，王孝杰大破吐蕃，复取安西四镇，当时有人以为四镇悬远，请废勿守，边塞派先驱者崔融就献议说：

戎狄为中国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汉以百万众困平城，其后武帝赫然发愤，甘心四夷。张骞始通西域，列四郡，据两关，断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筑令